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記憶， 我們的戰爭： 英國對二戰的 記憶與反思

蔡維屏 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歷史系講師

前言

那天，坐在一個小小的客廳裡，七十多歲的男主人從他身後的壁櫃裡，取出一個紅色檔案袋和一個如巴掌大小的長方形錫盒子。因為與空氣長期接觸，這個錫盒子的外表早已經有氧化腐蝕的現象。改變的顏色使得壓凸在上面的幾行字不太容易辨識。仔細一看，上面的大字寫着“Emergency Ration”（緊急配給）。下面的幾行較小的字體除了交代如何打開這個盒子的方法之外，還特別強調只有在命令之下才可以將它開封。盒子裡面本來應該是密封着一塊在緊急狀態之下可以支持一個士兵 24 小時的巧克力。如今這個盒子裡裝的是一個名字為詹姆士·唐密尼（James Tominey）的士兵的所有物：一個錫片做的腰帶扣環，一個上面寫著「英兵」兩字，一個有著編號的鐵牌，一小段橘色、藍色和白色為主的殘留緞帶，顯然曾經是被用來搭配某個勳章，2 張日本占領緬甸時發行的紙鈔，面額為 10 盧比和 5 盧比，和幾個 1944 年烙印着英國喬治國王頭像的印度盧比銅板。（圖 1）

在那個下午，在那個客廳，我聽了這個叫做詹姆士·唐密尼的人的半生故事，也學習了不少英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I. 一個戰俘的故事

這個紅色檔案袋裡裝了一些早已泛黃的



圖 1：緊急配給盒和內容物

紙片、文件、照片和證件。除了泛黃的顏色以外，每張紙散發出一股煙草臭味。紙張上泛黃的顏色是時間的烙印，而那股煙草味卻是來自這個男主人。

詹姆士·唐密尼，1920年12月14日出生在蘇格蘭西南方一個叫Motherwell的小鎮，當時的人口大約為四萬人上下。從1880年代開始，這個靠近格拉斯哥（Glasgow）工業大城的小鎮以生產鋼鐵和煤礦為主要經濟活動。在1930年代，蘇格蘭的大部分鋼鐵是從這裡產出。直到1990年初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關閉鋼鐵工廠之前，這個小鎮的絕大部的家庭都有男性成員從事鋼鐵的相關工作，常常不只是一代，而是好多代。這個鎮的名字的前身是Ladywell，起因為當地的居民把一口好井貢獻給聖母瑪麗亞。在這個並非特別富庶的地方，

很多居民是從愛爾蘭移民過來，辛苦的體力勞動是他們基本的經濟來源。因為煉鋼工廠24小時運作，夜晚的天空常會定時地被熊熊的爐火給映紅。

唐密尼的家庭成員眾多，他的父母共生了十四個小孩，其中三個小孩夭折。他排行第三，家人一直叫他「吉米」。他的父親約翰，在成為煤礦工廠的一個監工之前曾經加入蘇格蘭高地輕裝步兵團，並且在20世紀初被派到位於印度北方靠近尼泊爾的一個叫勒克瑙（Lucknow）的城市。（圖2）後來約翰也回到歐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參與了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Somme）。在這場激烈的戰役中他頭部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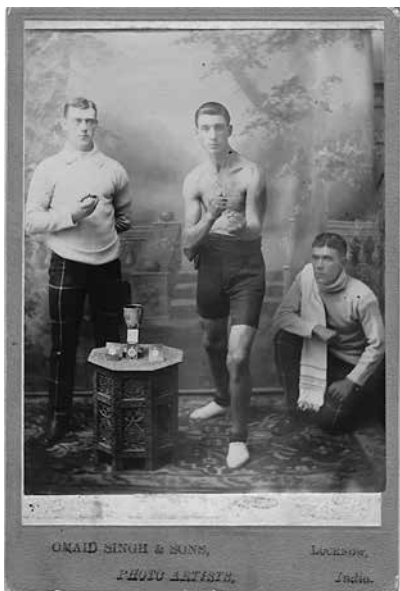


圖 2：約翰（最左）攝於印度勒克瑙

傷，所幸存活下來。這場發生在法國北方的索姆河戰役是一戰當中最慘烈的會戰，不但整體傷亡人數達到百萬以上，也是第一次把坦克車使用在真實戰爭。就單在這場戰役中，大英帝國的聯軍，包括英國、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傷亡人數約為 42 萬人，其中英國的官兵約為 35 萬。法國的傷亡官兵約為 20 萬人，德軍傷亡人數約為 46 萬 5 千人。

吉米在 19 歲時，投入了地方自衛隊（Territorial Army），性質如後備軍人，在平時工作之餘，定期接受軍事訓練。就在他加入這個組織的半年之後，英國正式向德國宣戰，他也因此從地方的自衛隊被轉移到陸軍編制下的騎兵隊（Lanarkshire Yeomanry）接受訓練。（圖 3）他在 1941 年被分發到印度，參與了英軍在亞洲的戰場。在緬甸待了數月之後，他抵達了新加坡。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攻擊珍珠港。這讓遲遲不肯參戰的美國終於向德日宣戰。日本的這個行動不是個獨發事件，相反的，它是日本發動全面對東南亞作戰的一個環節。珍珠港事件是與日本對泰國和馬來西亞的攻擊相互配合的。就在日本攻打珍珠港的隔天，日本也進軍南中國海，並以空軍的優勢打敗了英國長期引以為傲的海軍，擊沉了英國數艘軍艦。1942 年 2 月初，在拿下絕大部分的馬來西亞半島和泰國之後，新加坡成為日本的下一個理所當然的目標。新加坡



圖 3：吉米（可能攝於印度）

戰役從 1942 年 2 月 8 日持續到 15 日。部分日軍從新加坡登陸，部分日軍從泰國把英軍也逼退到新加坡。在南北夾攻之下，約有 8 萬 5 千的英國聯軍被俘虜。若加上之前不久在馬來西亞戰役中的 5 萬士兵，英國聯軍總共有超過 13 萬以上的士兵在東南亞成為日本的戰俘。年輕的吉米是其中一個。新加坡的樟宜戰俘營是他的第一站，之後他被送到馬來西亞去修鐵路，後來因為生病又轉回來樟宜。

在日本占新加坡的前一天，他的家人還收到吉米拍的一個報平安的電報。到了 3 月下旬，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之下，吉米的家人接到一紙由皇家陸軍砲兵團寄出的書面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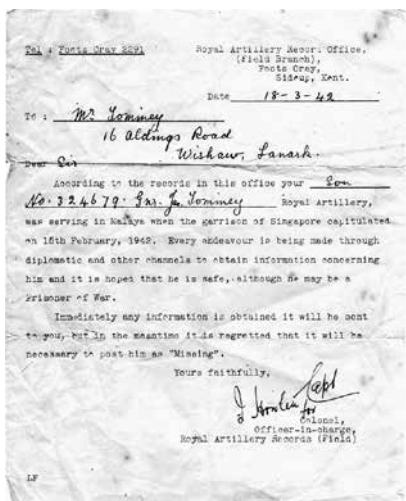


圖 4：皇家陸軍砲兵團給吉米家人的通知書

知，（圖 4）說明吉米可能已經失蹤，但也有可能被日本俘虜的消息。在無法獲得正確消息的情況之下，陸軍暫時把他歸類為「失蹤」。這是一個英國政府處理某個士兵可能已經戰死但又無法確定的情況下的標準作業模式。這個消息無疑給吉米的家人帶來不少擔憂。面對兒子的生死未卜，父親四處打聽，甚至向地方上的報紙投訴，希望能夠聯合地方的力量盡量打聽出兒子的消息。

日本對於提供完整的戰俘名單非常不願意配合。少於四分之一的戰俘的家庭在 1943 年 1 月之前獲得任何通知，而到了 1943 年 9 月時才有 65% 的戰俘家庭獲得通知。也許對他的安全最好的證據就是他寄回家裡的那張「俘虜郵便」明信片。他手寫著：

親愛的母親，我安全而且很好。收到你們的三封信，日期壓在 7 月。希望家裡一切都很好。給全家人愛，吉米

在這張郵簽的左上角他附上了的編號，在編號的右邊他也寫下 POW，代表著戰俘的縮寫 Prisoner of War。（圖 5、6）我們不知道這張日軍發行的「俘虜郵便」明信片的日期，但預估大約是在 1942 年年底到 1943 年之間。他那個時候已經被轉到馬來西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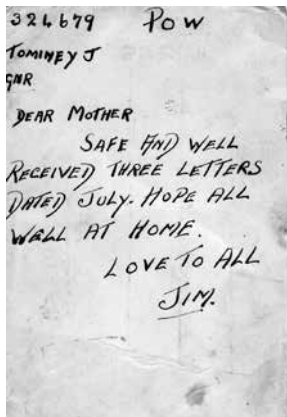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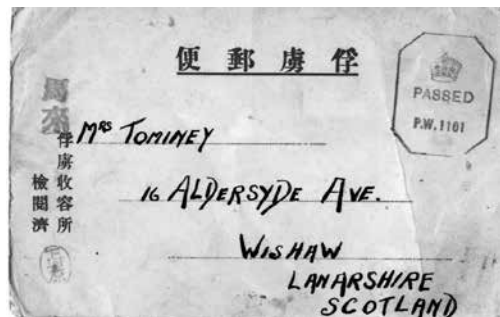


圖 5（上）、6（左）：
吉米寄回家的明信片

日本政府並沒有打算遵守1907年「海牙公約」和1929年「日內瓦協議」裡有關對待戰俘的規定。根據戰後在東京舉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調查，被日本看管的西方戰俘的死亡率是27%左右，是德軍和義軍俘虜士兵的7倍。日本把西方戰俘分散到各地，有的被運到日本做勞動，有的被送到泰國和緬甸，在非常危險的環境之下修築鐵路。有的被分發到臺灣，例如到金瓜石挖礦，或到屏東種植甘蔗和製糖。在屏東的工作因為可以與糖接觸，和其他辛苦危險勞動比起來，被公認為最好的差事。

在紅十字的協調之下，日本在1942年7月起同意提供這些戰俘有限的通郵。吉米那張手寫的明信片可能就是搭上這班郵輪，或者在這之後。接下來吉米又寄了3張明信片回家，時間都間隔很長：1943年12月、1944年8月和1945年3月。這些明信片上的訊息和之前那張一樣，都非常簡短，報平安的功能大於一切。不同的是，這後3張的內容都是打字完成，然後由吉米簽名。雖然那時的他應該已經是瘦骨如柴，這3張明信片都是以同樣一句話做開場：「我很健康、很好。」

歐洲戰場在1945年5月8日就結束了，但亞洲戰場仍然持續下去。同年7月「波茨坦宣言」向日本喊話，希望日本放棄投降。直到美國在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後，日本終於在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28日，皇家澳洲空軍發給戰俘一張傳單，無疑改變了這些戰俘的命運。（圖7）當時在樟宜某處醫院裡接受治療的吉米也收到這個傳單。他用鉛筆在這傳單上記錄著對他而言生命中相當重要的一刻：“Dropped by Liberator (RAAF) about 5/30pm Tuesday 28th Aug 1945 in Hospital Ground Chan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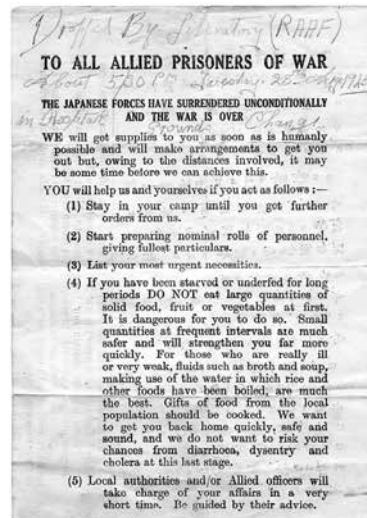


圖7：皇家澳洲空軍1945年8月28日給戰俘的傳單（正面）

這個傳單有兩面。正面的文字首先告訴戰俘，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戰爭已經結束了。它也告訴戰俘，人道的救援會儘快趕到，但由於距離的關係，可能還要再一些時間，請他們先留在原地等候。這個傳單用更多的篇幅告訴這些戰俘們飲食須知：必須煮熟食材，以避免感染傳染病；千萬不要吃太

多硬食；少量多餐比較好。傳單的反面則以日文說明日本投降的消息，和戰俘如何因應的簡單指示。（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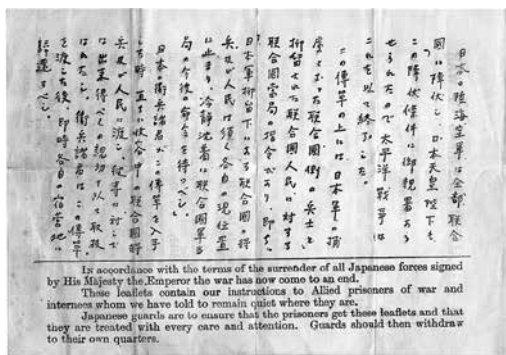


圖 8：皇家澳洲空軍 1945 年 8 月 28 日給戰俘的傳單（反面）

在蘇格蘭的家鄉，吉米的家人除了收到他拍的電報以外，還收到一封由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 Limited）總裁署名的信。這信上寫著為了讓在家鄉的家人儘早知道他們在遠東家人的平安，大東電報局免費傳送吉米所拍的訊息。這個老牌的英國電報公司在 1852 年成立，一開始經營英國、都柏林和法國之間的訊息傳遞。後來經營的範圍擴展到美洲和亞洲，很多地方都有設點。另外，信上也寫到若吉米的家人也想拍電報給他，只要他們到當地的大東電報分局或者有接受電報服務的郵局，大東電報局也樂意免費傳送約 12 字左右的訊息。（圖 9）

吉米終於踏上回國的路程。中間輾轉到了印度，隔年初他終於回到蘇格蘭。（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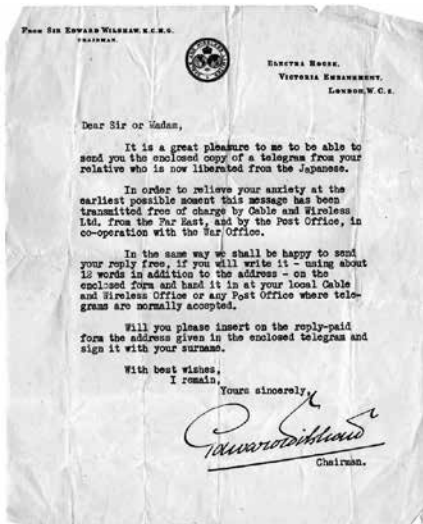


圖 9：大東電報局總裁署名的信



圖 10：吉米在回國途中於印度給家人的電報

也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吉米並非是家人在二戰中唯一參與戰爭的小孩。他的二哥

加入了他們的父親之前所屬的蘇格蘭高地輕裝步兵，後來也被派遣到印度。在二戰時成了 Chindist 團的一員。Chindist 是一個特種部隊，主要在印度和緬甸叢林從事抗日游擊戰。這個名字的來源是英軍將緬甸佛寺前獅面守護獸的名字 Chinthe 擬人化而來。也許這個獅面守護獸也喚起了這些英軍對自己國家的榮譽感。因為獅子也出現在英國皇家徽章上，金色獅子代表英格蘭，紅色獅子代表蘇格蘭。

吉米家中還有另外兩個兄弟被編入後備軍人的組織中。他們之所以沒有被徵召到前線去作戰，是因為他們的專業為造船和煉鋼，所以被留在原來崗位負責生產武器。

出現在家人面前的吉米非常的瘦弱，他的腰圍就如同他還未見過面的 8 歲小妹的腰圍一樣。他雖然繼續接受治療，但終究因為健康因素，只好辦理離職。在離職證書上，他的長官給他這樣的評語：「一個穩重和靠得住的男人。成為日本戰俘之後，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還能保持最高水準。」

II. 戰爭的恐懼

唐密尼家的故事是許多參與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國家庭的縮影。對於當時很多英國人而言，戰爭是他們生命中的一個部分。如同唐密尼家一樣，有很多英國家庭是同時見證和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在一戰中大英國協總共動員了約 868 萬人投入戰爭，其

中有超過 400 萬是從英格蘭來，有超過 55 萬是從蘇格蘭來，超過 27 萬人從威爾斯，超過 13 萬人從愛爾蘭徵召。在這些總數裡面，大英國協的聯軍死傷和失蹤的人數超過 95 萬，其中有超過 70 萬人是從英國徵召的。

有很多英國人對一戰之後的德國保持同情的態度。他們認為由法國強力主導的凡爾賽條約過分制裁德國，讓德國喪失民族尊嚴而導致了右派軍國主義的崛起。此外，在一戰沉重的傷痛和恐怖的記憶之下，英國人不想再有戰爭、畏懼戰爭；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面對希特勒的諸多軍事行動和挑釁，英國保守黨政府寧願採取談判和妥協。在 1930 年後半，當時全英國似乎只有邱吉爾看出希特勒的真正目的，並且主張強力制裁。但事實是，英國的厭戰導致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不到最後關頭不放棄和平途徑。最終，德軍在 1939 年 9 月 1 日破壞協定，進入波蘭，英國才願意面對戰爭已經無法避免的事實，兩天之後攜手法國對德宣戰。

雖然在二戰中犧牲的英國士兵人數約為 32 萬，遠比一戰還少。然而二戰採用的新型的空襲導致很多英國人嚐受到另一種戰爭帶來的恐怖。英國在一戰期間就曾經經歷過德軍發動的空襲，但其威力並不大，而且次數不多。更先進的飛機與更具有威力的炸彈在二戰期間被採用。除了大量的載彈飛機被使用之外，在 1944 年之後德國對英國發射的對地攻擊巡弋飛彈（V-1 flying

bomb) 和一種中程彈道導彈 V-2 火箭 (V-2 rocket) 也重創英國本土。和一戰的集中歐洲戰場相比起來，空襲讓在英國本島的民眾直接經歷了死亡的威脅。

雖然英德雙方一開始約定不轟炸平民，但到了 1940 年 8 月，英國轟炸柏林以報復德軍意外炸燬英國民房。也許雙方早就等待機會來破壞此約定。自此德軍對英國發動了將近九個月的密集轟炸。在這九個月中，德空軍投下超過 1 百噸的炸藥。英格蘭本島和蘇格蘭都有不少城市受到空襲。較集中的攻擊為倫敦 71 次，伯明翰、利物浦和普利茅斯各有 8 次，布里斯托有 6 次，格拉斯哥有 5 次。在二戰中因為空襲而喪生的英國人共計約有 4 萬多人，其中近一半是在倫敦。

在倫敦的諸多次空襲中，其中又以 1940 年 9 月和 10 月的那波密集空襲和同年 12 月 29 日的那次最為嚴重。在 9 月 7 日，納粹空軍從在法國的基地出發，將近有 1,000 架的飛機，其中大約有 350 架飛機配載炸藥，並由 600 多架飛機護送穿越英吉利海峽。這個持續將近 30 日的轟炸造成倫敦地區約有 6,000 死亡和兩倍以上的人受傷。而在同年的聖誕節過後的 4 天，納粹空軍又發動另一波空襲，這波空襲的主要對象鎖定為聖保羅大教堂。聖保羅大教堂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 604 年，目前的英國巴洛克風格建築體則是在經過 17 世紀下半的倫敦大火之後修建而成。在 1962 年之前，它是倫敦市內最高的建築物。希特勒認為若能攻下被英

國人視為精神象徵的圓頂聖保羅大教堂，就能夠給英國人沉重的打擊。

如同往常，倫敦實行夜晚燈火管制 (Blackout)，大部分的街燈都被停掉，公共建築物和每個家庭對燈的使用也減少到最低限度。整個城市應該是黑暗的，以減少敵機對目標物的識別。在下午 5 點 20 分英國偵測到首架德機，6 點 8 分空襲警報在市區就響起來了。6 點 15 分左右，第一顆炸彈落下，開始了長達九個小時的空襲。

德軍除了投下炸彈之外，他們也使用燃燒彈以引起火災。大量的炸彈和燃燒彈被投在聖保羅大教堂的附近，多處已經出現火災，整個東倫敦市區的天空呈現紅色。大量的高溫造成局部的氣流，這讓本已難以控制的火勢更加兇猛且到處竄延。邱吉爾下令要消防系統全力保護聖保羅大教堂，而教堂裡的兩百位志工也待命着。雖然沒有一枚炸彈直接擊中教堂，但數枚燃燒彈掉在教堂的屋頂上。此外距離教堂的圍牆不到 10 公尺的周圍建築物都早已燃起熊熊大火，導致教堂建築體的溫度也逐漸上升。在這九個小時內，約有 2 萬 4 千枚炸彈和 10 萬枚燃燒彈被丟在聖保羅大教堂附近，無數棟的建築物遭到損毀，有的甚至燃燒數日。而大教堂竟然奇蹟似地存留下來，這無疑地給了英國的士氣注入了一劑強心針。這個精神指標的保留被英國人視為是上帝給他們的正義終究會戰勝邪惡的保證。

圖 11 為英國《每日郵報》(Daily



圖 11：聖保羅大教堂劫後景象

Mail) 攝影記者 Herbert Mason 所攝聖保羅大教堂的劫後景象，照片很快成為家喻戶曉的影像，並且成為英國的二戰記憶中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很多在倫敦和倫敦以外的家庭也經歷了空襲，或受到空襲帶來的傷痛。因為二戰採用的前所未有的空襲戰法，使得很多英國家庭面臨家人分離的痛苦。英國政府知道空襲戰無法避免，為了保留國家的命脈，從 1939 年 9 月 1 日起，對平民進行「疏散」。諷刺的是，這個計畫的名稱竟然是從德國格林童話故事「哈梅爾的吹笛人」裡找到靈感，而稱為「花衣吹笛手行動」(Operation Pied Piper)。

到二戰結束前，總共約 350 萬人被疏散，其中一大部分是把重工業城市中的小孩疏散到鄉村，有的甚至被送到國外，例如加拿大和澳洲。第一波疏散行動發動後的 3 天裡就大約有 80 萬的學齡孩童被送走。另外

還有 50 多萬的母親和 5 歲以下的小孩，以及大約 1 萬多名的孕婦也在這頭 3 天裡被疏散。

英國政府並沒有為這個疏散計畫做好準備，很多小孩在出發前並不知道他們將被帶往哪裡去，也不知道他們的接待家庭是否已經被安排好。很多父母也對自己小孩的去向沒有確切的概念，他們只能選擇相信政府。有不少的案例是小孩子到達某個地點之後，被領到社區的活動中心，靠着牆排好，然後當地的接待家庭就會如同挑選牲畜一樣來指點說「我要這個」，然後帶走。

對這些小孩而言，雖然他們首次有機會接觸到鄉村生活，但也被迫和父母分開。在寄養家庭中的生活並非開心，也造成他們心理上的衝擊。很多小孩都希望父母能夠儘快地把他們帶回家。的確也有很多小孩在數週之後就被帶回，而也有很多小孩一直在二戰結束之後才與家人團聚。為了防止家人把小孩子領回家，英國政府大力宣導，希望父母親能夠理性，做「正確」的事情。(圖 12)

此外，很多家庭必須去學習如何躲避空襲。英國政府研發出一個可以在每個家庭的花園或附近空地裝置的「安德遜防空洞」(Anderson Shelter)。這個由 14 片鐵皮搭成的防空洞高為 1.8 公尺，寬為 1.4 公尺，長為 2 公尺，可以容納 6 人。居民必須挖一個深 1.2 公尺的洞，然後把它裝置進去。最後還要在鐵皮架的頂頭上覆蓋 38 公分厚



圖 12：二戰期間英國政府宣傳海報，要求英國父母不要把送到鄉下的小孩帶回城市裡

的土，才算完成。這個防空洞的結構說明和搭建方法很容易取得，所以家庭可以自行搭建。（圖 13）低收入戶可以免費獲得這個防空洞，但收入較高者，若不想自行搭建，則可以以 7 英鎊（相當現在 390 英鎊）的價格購買。若不計算個人私自搭建的，有超過 350 萬個這種防空洞被生產。很多家庭在覆蓋着泥土的防空洞上種菜或花草，在二戰結束之後雖然有很多這類的防空洞被回收，但目前在英國還是可以看到這些沒有被回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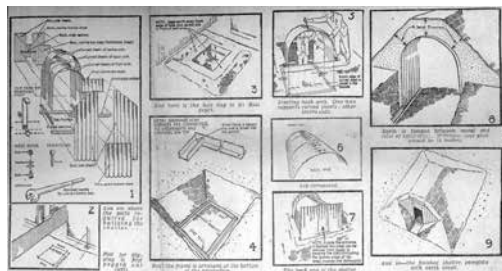


圖 13：安德遜防空洞結構說明



圖 14：民眾在安德遜防空洞上面種菜的防空洞的身影。（圖 14）

III. 二戰的記憶

唐密尼家庭也有個安德遜防空洞。到了 1960 和 1970 年代，他們家的小孩還在防空洞上玩耍。雖然他們家族裡並沒有成員在

「花衣吹笛手行動」中遭到疏散，但因為 Motherwell 這個小鎮生產鋼鐵，並且非常靠近格拉斯哥，也遭受到數次大型和多次小型的空襲。躲空襲是他們二戰生活中的一部分。到了冬天，這個防空洞就會非常的冷，非常不適合久待。對於從小就對戰爭耳濡目染的唐密尼家庭的小孩，他們家族的記憶超越了他們個人所生長的時空，而與整個大英帝國的命運在某個程度上相連結。

從前年開始，英國就已經處在濃厚的紀念歷史的氛圍之中。

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 1 百週年，而去年除了是二戰 70 週年之外，也是滑鐵盧戰役的兩百週年和英國大憲章 8 百年的紀念週年。對這個曾經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老牌帝國來說，此刻對過去的反思似乎需要更加深沉和慎重。根據去年由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發表的一篇名為“Remember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War”的研究調查報告中指出，在經過 1 百年之後，目前大概還有 37% 的英國人說他們的家人或者社區裡的人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直接參與打仗。有 9% 的人說他們的家人或者社區裡的人曾經以其他的方式支援過一戰，例如運輸、挖壕溝或提供醫療救濟等等。有 15% 的人說他們的家人或者社區裡的人因為一戰而死去。有 9% 的人說他們的家人或者社區裡的人曾經因為一戰而受傷。

而在被問到在過去 1 百年中哪三個國

際事件對目前的世界局勢最具有影響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得到 85% 的英國人的選擇，2001 年發生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獲得 57%，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得 52%。的確，從工業革命期間創造的榮景到二戰之後的沒落，英國人對這些戰爭的記憶和感受深刻地影響他們現在對國家定位、歐盟未來和中東局勢等等問題的看法。

在 1951 年 12 月，回鍋的英國首相邱吉爾與戰後德國第一位總理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有這麼一段對話。邱吉爾告訴阿登納，我向您保證，英國會永遠與歐洲站在一起。阿登納回答邱吉爾：「您讓我失望了，因為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儘管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都扮演著吃重的角色，然而畢竟在地理上與歐洲有一水之隔，並且兩次大戰的主要戰場都不在英國本土，英國人對歐洲和歐盟的態度可以與法國人和德國人不同，而保有某個程度上的自由度。對於這點，德國與法國人就算可以理解也不免感到吃味。

有很多人可能會誤解般地認為，英國人似乎對自己的國家到底是不是屬於歐洲的一部分感到困惑。但事實是，對絕大多數的英國人而言，他們對這個議題的立場是非常清楚而堅定的，並非如外人想像中的猶疑和模糊。英國人只有兩種，很少在中間游移：一種是堅定的認為英國就是英國，而不是歐洲；而另一種是認為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很多持著第一種態度的人認為歐盟和歐元是

個走到死胡同的設計，他們慶幸英國沒有加入歐元。不少這類的人還甚至認為，解套目前歐盟困境的最好方法，是回復到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簽訂之前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持著第二種看法的人則反抗保守主義，懷抱著理想主義和社群主義，他們通常是較為左派或者比較年輕族群。但絕大多數在這個族群的人，也不願意放棄英鎊採用歐元。

若以近代歷史的脈絡來觀察，從滑鐵盧戰役到二次世界大戰，都可看出英國雖無需成為歐洲的絕對霸主，但它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在阻擋某一國家成為在歐洲的單一霸主。而這種心態，在某個意義上，延續到它一直以來對於歐元和歐盟的旁觀者姿態。1930 年代末期，歐洲各國的沉默以及英國的縱容造成沒有及時阻止希特勒的軍事擴張。在宣布對德作戰之前，那時英國首相張伯倫長期漠視邱吉爾的警告，一度沾沾自喜的認為他與希特勒的和平協定會確保歐洲的穩定。這種自我安慰的做法一直到德軍進攻波蘭，才讓英國深刻感受到威脅以及和平的不可能。英國在沒有做好萬全的軍事準備狀態之下硬著頭皮宣戰。而在這 70 週年的紀念日，整個歐洲和英國也再度面臨對於歐洲前途的思考。眼前歐洲面臨棘手的問題，例如俄國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和歐元體系的危機，和當前的難民潮問題。此外一直無法處理的高失業率，尤其在年輕人族群，更造成歐洲諸國內部的不安。英國一方面慶幸沒有加入歐元，但另一方面卻也接收了大量

到英國打工的歐洲人。有不少英國人認為這些歐洲人造成英國福利和健保支出過高、房市擁擠，並剝奪英國人的就業機會。此外每年繳交給歐盟的年費絕大部分都被拿去支援其他國家，而英國並未有特別好處。以 2013 年的數字來看，英國給歐盟的金額是排名第二，僅次於德國。而從歐盟得到金援最多的國家前五名排行分別為波蘭、希臘、匈牙利、葡萄牙和羅馬尼亞。

根據 2014 年 10 月由 NatCen（全國普調）這個在英國算是權威的民調研究機構，針對英國社會對歐洲的態度的調查，有 64% 的英國人不覺得他們是歐洲人。同樣的問題在德國和法國做調查，有 25% 的德國人不覺得他們是歐洲人，而有 36% 的法國人不覺得他們是歐洲人。問到英國是否應該留在歐盟，有 35% 的英國受訪者認為英國應該退出，有 38% 的受訪者認為如果英國要繼續留在歐盟，歐盟應該先同意減少它的權力。而在這個調查裡表示覺得自己是歐洲人的英國人當中也有 43% 的人認為歐盟的權力應該要被削弱。

除了英國與歐洲的關係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英國人的另外一個衝擊，就是在眾多過去的殖民地和在冷戰的局勢中，所衍生的諸多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上面常會遇到的一個公約數就是伊斯蘭教的問題。這個伊斯蘭教的問題不僅是個「外國」問題，也是個敏感的內政問題。依據 2011 年公布的全國人口統計調查，有 270 萬的合格受調查者

自認為是伊斯蘭教，約占當時英國總人口的 4.5% 左右。但估計實際居住在英國的伊斯蘭教人口應該更多。英國政府和社會在面對與伊斯蘭教和文化相關的議題基本上都是非常小心的。基於過去一連串在二戰前的殖民歷史、冷戰時期的角力和近來攻打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軍事行動，整體英國社會對伊斯蘭問題反而呈現出一種擔憂和困惑的情況。這與面對歐洲問題時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多英國人對於歐洲問題，不論是持何種態度和看法，絕大部分的時候都可以侃侃而談，不太有心理負擔。然而當面對伊斯蘭問題時，英國人的扭捏和膽怯就顯現出來。同樣的，英國人可以很暢懷地以西方的普世人權觀來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但遇到與伊斯蘭文化差異，他們就會自動採取寬容和理解的態度。

對於 2015 年 11 月在巴黎發生的伊斯蘭國恐怖攻擊事件，英國人普遍感到相當震驚。在辯論之後，英國國會也過半數，決定要加入法國對伊斯蘭國發動空中轟炸的行動。然而這樣的決定在很多英國人眼中並非是最明智的決定，尤其在年輕的族群裡。在大學校園裡和一般年輕人的社群網站裡，有絕對過半的年輕人覺得戰爭和武力只會加深仇恨。他們雖然同情法國，也認為這個恐怖攻擊應該被譴責，但他們也認為西方國家過去在伊斯蘭國家裡所種下的果和文化的差異是造成這類攻擊的主因。有過半的人認為轟炸伊斯蘭國並不會使英國更安全。對於

敘利亞難民的收容問題，不同於他們父母或祖父母輩的態度，這些大學生很多也認為英國有責任接收更多難民。他們不認為這些難民會造成英國的經濟負擔，甚至使他們本身的工作機會減少。面對過去充滿戰爭與仇恨的歷史，英國的年輕一代很清楚地要選擇和平這一條道路。

IV. 結語

很多國家把 11 月 11 日訂為國殤日（Remembrance Day），以紀念一戰的結束。在英國每年則在靠近這個日子的星期天舉行儀式。英國人用這個活動來提醒自己這個悲慘的過去，並勉勵不要重蹈覆轍。如今這個紀念活動也把緬懷在二戰犧牲的英雄納進去。幾乎在每個英國社區，哪怕是很小或者處於很偏僻的地方，一個十字的紀念碑或是一個簡單的石柱碑總是會被矗立在那個村裡最明顯的位置。每年的那天，當地居民不論人數多寡，都會舉辦一個簡單的儀式。（圖 15）

為了慶祝二戰勝利 70 週年，英國國家檔案館在今年 9 月 4 日宣布開放二戰戰俘的資料庫，其中包括了歐洲戰場和亞洲戰場的戰俘。這些檔案包括了公文、報告、回憶錄和日記。有些是戰俘在監獄裡的生活的詳實記錄和如何策劃脫逃的過程。這個資料庫還包括了 36 萬張照片，還有戰俘在遠東地區的醫院登記錄。



圖 15：在村莊舉辦的典型的紀念一戰和二戰儀式

在英國人的心中，戰爭並沒有很遙遠。

這位把吉米的資料保留了這麼久的男主人，也告訴我他如何和吉米認識。他們是同鄉人，但彼此不認識。這位男主人在 18 歲時加入英國皇家空軍，在 1956 年被分發到吉隆坡。就在他要出發的前一刻，吉米找上了他，並且請他若有機會到新加坡去，是否可以替他到 Kranji 戰爭墓園去尋找他的老戰友的墳墓。他的老戰友在 1944 年死在日本監獄裡。男主人去了，也把吉米老戰友的墓地拍照寄回給他。後來這位男主人在回到家鄉後，娶了吉米的妹妹。

參考資料：

1. British Council website, 'Remember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War', 2014.
2. Defence Network Media website, 'Operation Pied Piper: The Evacuation of English Children During World War II'.
3.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website, 'The Evacuated Childre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4. Laurence Ward, *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 Bomb Damage Maps 1939-1945*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2015).
5. BBC website, 'World War Two: History's most savage and devastating war'.
6. NatCen website, 'Britain feels less European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EU'.
7. Max Hastings, 'Censored for days, this picture was finally published in the Mail. Now, 70 years on, reveals the dramatic story behind THE iconic image of the Blitz', *Daily Mail* website.
8. The National Archives, 'British prisone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Korean War'.
9. Barbara Hatley-Broad, *Prisoners of War, Prisoners of Peace: Captivity, Homecoming and Memory in World War II* (Oxford: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5).